

回归故乡，与文学重逢

本报记者张博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故乡。莫言曾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过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这里有我们儿时的童年生活，构建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故乡是我们的“根”。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文学是作家的创作成果，造就作家生活的土地于是就成了“文学的故乡”。故乡是作家们文学成长的酵母，为文学的创作提供营养源。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秦川沃野，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这里的泥土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著名地标，也成了《文学的故乡》。

这部纪录片2016年开拍，2018年成片，2020年上线，不少观众等了四年，如今全网刷屏。导演张同道和他的团队跟随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回到他们出生的村庄，回到文学创作的现场，为我们讲述这些作家如何将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有网友评论，“《文学的故乡》将故乡的山水化为了作家文字中的血脉。”

与以往的文学纪录片不同，《文学的故乡》并不是简单地记录这些文学家故乡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也不是介绍某类文学的传承、特点和风格，而是借助这些各具特色、遍布大江南北的当代文学家生活的故乡，来展示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对今天文学的孕育。

记录朗诵《阿Q正传》的青年 “鲁迅”

“我们不用等到他们80岁的时候用沧桑的声音回忆创作历程，他们现在就充满力量。”谈及创作动机，导演张同道希望这些作家以年富力强的精神面貌去讲述“文学现场”——他们文学作品中的物理空间。

纪实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多好的演员也代替不了作者本人，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看到青年鲁迅在我们面前用浙江普通话朗诵一遍《阿Q正传》，但我们能将莫言、贾平凹这些伟大的当代作家记录下来。”

张同道常说他自己是“文学的逃兵”，他在文学博士毕业前曾跟随导师去过一次陕北，“剪花娘子”让他倍感震撼，进而对这些艺术萌生了强烈的记录欲望。“文字能表达极其复杂的情感，但任何文字展现精妙的剪花作品都是苍白的。”毕业后，张同道转行做起了纪录片。

从业以来，张同道拍摄过不少题材，有记录生活的《白马四姐妹》《小人国》《零零后》，还有记录历史人文的《贝家花园往事》。但他仍藏着一个文

《文学的故乡》“带”莫言等6位作家回创作现场寻“根”



▲《文学的故乡》中，莫言回到故乡山东高密。纪录片画面

学梦，文学始终是他心中的“故乡”。张同道是河北邯郸人，他的故乡和片中刘震云的故乡很像，有麦子、玉米，“很惭愧没有用文学的方式表达故乡的人和事。”张同道不希望让遗憾继续，“每个曾经热爱文学的人都不会把文学忘掉，通过纪录片表达文学的精神世界也是圆自己的梦。”2012年莫言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给张同道重圆文学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作家在作品中总是毫无保留，但多数却不爱面对镜头。想拍这些作家的人太多，但留下的影像资料却很少。莫言从2002年之后就不再接受任何拍摄，迟子建等人也不爱出境。怎样说服这些作家？这是张同道“圆梦”的第一步。

他找到莫言约拍，莫言回答的第一句话却是“作家不是演员，你不能让作家在镜头面前表演”。张同道有自己的沟通“策略”，时间长了不会答应，那就只定一天，不愿意拍摄就以采访为名，这样的“协商”下，莫言答应了一天的采访请求。“事实上采访也不止一天，莫老师特别理解支持我们，最终拍摄前后跨越3年，时长超过20天。”

拍摄期间，莫言时间安排紧张，为了完成拍摄，他去哪张同道团队就跟到哪，有段时间莫言刚好在排练歌剧《檀香刑》，他们也紧随其后，“他去

一次我们就跟一次，见缝插针。”凭着这股“巧劲与韧劲，作家们被他一一“攻克”。

他想让莫言走到当年那座发生冲突的小桥上讲述《红高粱》，阿来去土司遗址旁谈《尘埃落定》，迟子建漫步在白桦林回忆《北极村童话》……这些都将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笔珍财富。

地里长出的文学

土地不光能长出高粱，还能生出一代代文作品。“作家和养育他们的故乡时时刻刻都在互动，从出生起，他们就在和周边的动物、植被、土地交流，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默默丰满着作家们的感官世界。”跟随他们回乡拍摄，张同道也在思考故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的故乡包括作家的故乡，但又不限于此，影片里阿来说：“我不认为必须回到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才叫回到故乡。整个川西北高原，都是我的故乡。”张同道确实也不止拍了作家的故乡。《文学的故乡》团队和莫言一起在山东高密感受天开地阔，随着贾平凹下商州，跟着阿来去四川嘉绒藏区，与迟子建回到东北漠河，看刘震云如何走中原，找毕飞宇记忆中的苏北水

乡……

优秀的作家往往能提供大量原创性的文学景观，作家对生活的发现，对生命的体验都是一种文学风景。张同道刻意选择了不同文化区域的六位作家，涵盖了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大兴安岭文化、藏族文化、秦岭文化和水乡文化，各有特色，为的就是展现不同的文学景观。

故乡是作家的出生地，文学是他们思想的载体。作家不是演员，文学也不是，他们在纪录片中更像是主导者，与导演一同创作发声。张同道避免了任何“上帝的声音”，在采访完贾平凹之后果断放弃解说词——没有人比作家更了解他们的作品，再好的解说词比起贾平凹的陕北口音也会黯然失色。

文学是虚构的，但文学作品所托付的情感能是真实的。影片里，我们能看到不少作品原型人物的现状，《高兴》中的高兴原型刘书征如今改名刘高兴，卖起了贾平凹的书；《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如今已成了老林，生活依旧……他们会指着书里的情节说，“这里写的就是我”。

“这些作家和他们的文学元素在一起，就是我为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个‘文学现场’。”张同道说。

回归故乡，与文学重逢

故乡养育了人，人塑造了文化，而悠久的文化又被记录成一代代文学，哺育了人们纯粹的心灵，搭建了人们精神的故乡，给予人们以内心的“根”和归属感。张同道希望作家在回乡之旅中找到某种归属。

少年时，作家们的身影每日在故乡中穿梭，这里是他们想“逃离”的地方；长大离家后，家乡风貌又成为每一位作家作品中的印记。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变为新文学锐意奋发的支撑和底蕴。

“如果你一直在故乡，会恨这个地方。倘若你离开了故乡，再反观它，就会有一种表达的冲动了。”这些作家中不少人已异地定居，多年未回故乡。因此，张同道要求每个作家必须回一次故乡。“回到现场，跟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甚至一个碾盘都能接通，那个地方才有童年的记忆、生命的记忆。在别的地方展现不出完全裸露的精神状态。”

张同道进行的是“抢救性记录”。“生活一直在变化，再过些年，又会有不少东西丢失。”十年二十年以后，即使坐标相同，找不到半点记忆的地方也就很难被称为“故乡”了。

“故乡”里有儿时的伙伴、单薄的小木桥、

厚重的碾子、雪地上的白桦林……贾平凹看到儿时的学会感慨命运无常，“我要是到农村，可能还不如他”；“没有乡愁，没有故乡，甚至没有姓氏”的毕飞宇来到出生地，能毫无征兆地在油菜花田边掩面而泣；莫言看望老父亲，一嘴高密方言，我们这时会发现他就是农民的儿子；迟子建一到遍地白雪的白桦林里，完全像个孩子，皑皑白雪像是抹去了岁月的痕迹……

除去写实的风景，张同道还加入了不少写意内容。一道白光闪过，阿来推开寨门，二楼的土司正打量着他，阿来穿过楼梯向着他走去，土司却消失了。片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小说里的人物或场景，《莫言》一集中，民间艺人唱起小说里的诗歌，九儿、余占鳌等书中角色陆续出现，用虚构的方式讲述真实是导演的小心思。“这样能拍出文学的意境，而不是作家故乡的纪实。”

第三“故乡”——每个人都需要精神家园

《文学的故乡》中的“故乡”在张同道看来有三层含义：一是作家们出生和成长之地；二是新文学的“根”；三是每一位受众观后所找回的精神家园。

“我不期望《文学的故乡》有很多人去看，能够成为潮流。但我期望有人因为看了它，可以静下心去读一些书。”张同道担心社会大众对文学的兴趣会一直降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家对读书的热情正逐年走低。人们更多考虑的是房子、票子和车子，文学在社会中则日益边缘化。尤其是年轻人，一面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另一面又纵情娱乐，那么未来他们也很有可能步入无尽的空虚感中。”

这些担忧在数据上也得到了应验，国民读书量正与日俱“减”，国民阅读也与日俱“浅”。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相较于增长迅速的手机接触时长，不仅纸质书阅读量逐年下滑，电子书阅读量也在不增反降。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比2018年足足增加了15.54分钟，高达100.41分钟。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却比2018年减少了0.48本，只有2.84本。全国仅有超一成(12.1%)的国民平均每天阅读1小时以上图书。

“如果他们以后都不读书，只是用手机看娱乐新闻、刷刷热门段子，就好像每天都在吃薯片这类膨化食品，生命从此变得没有营养。”面对这种情况，张同道希望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文学的故乡》中的作家都是口碑之选，他们的作品真诚深刻，经典且有营养，能让读者们的生命有质量、有质地、有品质。

“假如能通过《文学的故乡》增进十个人或者上百个人对文学的兴趣，让他们人生的品质、精神的品质有所提高，这就完成了我的心愿。”《文学的故乡》属于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梦，找到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用《他乡的童年》，照照吾乡的教育

本报记者王若辰

什么话题能让素不相识的两个人打开话匣子，迅速找到共同语言？

大概就是教育。

聚焦于教育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一共六集，一集走访一个“他乡”，通过观察和展现日本、芬兰、印度、英国、以色列和中国的“童年”，带领观众进行一场没有标准答案和终点的追寻。

该片的导演、主持人、统筹是同一个人，周轶君。她曾是新华社战地记者，也曾是全世界唯一驻加沙的女记者，后来活跃于《圆桌派》《锵锵三人行》等谈话类节目，开专栏，出书，作品《埃及骆驼》进了小学语文课本。

她还有一个身份——两个孩子的妈妈。教育，也是她的切身之感。

行万里路，阅万里人，她带回《他乡的童年》。纪录片播出于此后的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超出以往的变化。在片子拍摄阶段，团队讨论过“居家学习”这个题材，当时觉得太过小众化，最终没拍。没人想到，转眼间，“居家学习”突然变成了家家户户都要面临的普遍现象。

“这部纪录片是我的解惑之旅，但我拍它绝不仅仅是表达自我，它具有公共价值。”周轶君说。

存不存在“最好的教育”？

教育，是一个人的迷茫，一代人的困境，还是全球性的共情？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教育的问题很困扰我，似乎也困扰着很多家庭。”周轶君说，“我做过多年国际新闻记者，对我来说解决困惑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去看。”

这一看，像是打开了万花筒。

在日本，幼儿园小朋友在坡地上攀爬奔跑，通过大声喊叫解放身体，课程教育和习惯养成教育都强调从小培养集体性，甚至有些幼儿园的门都设计成关不严的样子，提醒小朋友随手关门，养成严谨、有始有终的习惯。

在芬兰，小学五年级前没有考试，不鼓励竞争，崇尚平等，信奉“独立是自由学习的基础”，可以穿着女巫装上课，也可以腿挂在课桌上、抠着肚脐眼儿读书。最好的学校，就是离家最近的那一所，因为每所学校的质量都一样高。

在印度，你会看到培养出众多CEO的土壤，大学的目的是把马带到水边，并让马觉得口渴。“也能窥见全社会异质、矛盾又统一的横断面。

以色列，十几岁的孩子在声光电交错的实验室设计、制造机器人，为自己的项目与赞助商谈合作、忙公关。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创造着创新本身——这里是创业之国，是风投、高科技、共享经济和创业者的乐园。

周轶君把天下父母寻找教育之道的行为，形容成“神农尝百草”，父辈的经验、“别人家的孩子”、育儿畅销书、天才养成术，还有自己的经历与教训……有句话说，家长都是天然的教育者。

可疫情停课期间，“神兽”归笼，很多家长深感“本领恐慌”。周轶君面对家中俩娃，也经历了一场“磨性子”的修行。

“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本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家校教育的比例失衡了。”周轶君认为，孩子居家学习，家长应扮演助教的角色，如何培养孩子的自觉性，提高学习效率，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摸索，慢慢磨合，随时调整。“最重要的是帮孩子找到最适合的学习模式，而不必纠结于孩子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功课。”

同样是讲课，在家上网和在教室坐着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这次停课也让我们发现，通过网络传输知识点并不是教育的全部，孩子们在课堂里的互动，学校教育的实体环境，这些都特别重要。这也促使我思考，面对的教育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周轶君发问。

孩子停课期间，周轶君自己给社区小孩们上课，“讲课本上不会教的东西”。

比如，周轶君借疫情大流行给孩子们讲全球化。这些孩子七八岁，还有年纪更小的。“之所以课本不教，可能是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成人才该学的东西。其实孩子们能从身边的事物去理解全球化，比如餐桌上的食物，还有经历过的旅行。”

为人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存在吗？

“存在，最好的教育就是最适合这个孩子的教育。”说起来容易，可什么才是最适合的？

周轶君觉得，首先家长应该“站在孩子身后半步”。“你要有耐心去观察他，有能力去理解他。”做到这两样就非常不容易，可以避免很多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冲突。

其次，家长的责任是把孩子与生俱来的能力和特质，“再往前推进一步”。无论生于怎样的家庭，都不该生活在父辈的光环或阴影下，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都是“璞玉”，可磨成器。

拍过这么多国家，哪里的教育最好？

“我觉得都不完美。哪国的教育，都是利与弊的一个平衡。很多人向往芬兰的教育氛围，但也有认为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孩子走到其他国家，也许在竞争环境下很难适应。”周轶君说。

有言道，绝对的自由并不是给孩子的一个人物，甚至可能是一种痛苦，就像一片羽毛在空中飞翔，看似自由，但实际上它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周轶君很喜欢这种说法。“孩子有梦想你要支持，但不等于说，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引

当你看到世界那么大，
教育方式也很多元时，相对
来说就没那么焦虑。从这个
角度说，我们希望纪录片提
供一种“看到”的力量

长时有一道题：您会在孩子20岁时对他她说什么？

周轶君的答案只有四个字：出去看呗！

不过孩子20岁之前，家长应该做什么？对这道“题”，周轶君的答卷很长。“在孩子出去闯荡之前，我能做的事情是养成他所需要的基本能力。比如，要有好奇心，要知道怎么去观察，怎么去找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要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坚韧正直的品格，对人性的认知，等等。”周轶君说。

当下，越来越多“小皇帝”“小公主”当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时间都用于练钢琴、解奥数、学编程。特长一列一长串，但连打个鸡蛋都不知如何下手。

“这不仅仅是自理能力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孩子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缺失。”周轶君说。

媒体人的身份，让她一直是一个客观理性的观察者。“除了生活教育不足，我认为当今孩子们普遍体育锻炼不足，美育也不够。”周轶君坦言，除了孩子，家长也存在问题。

“我们总把孩子视为未成年人，认为他没有资格去理解成年人的世界，他不足以分辨对与错。成年人不相信孩子的直觉和选择，这是对他们的信任不够。另外，我们的童年教育是一个‘催促长大’的过程，似乎孩子把童真、混沌的东西尽早抛弃就是好的，如果3岁就会做大学题，那就是最好的孩子。”周轶君发问，“家长这么做对吗？”

《他乡的童年》印度一集中，女孩伊什卡·戴伊怀揣演员梦却不受家人支持。中国也曾有调查显示，新生代中很多孩子的理想是“网红”。

“孩子想当网红，家长要和孩子讨论，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名声，还是超越同行的业务能力？”周轶君说。

有言道，绝对的自由并不是给孩子的一个人物，甚至可能是一种痛苦，就像一片羽毛在空中飞翔，看似自由，但实际上它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周轶君很喜欢这种说法。“孩子有梦想你要支持，但不等于说，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引

导，只知道妥协。”周轶君强调，引导要趁早，过晚的引导很容易变成“专制”，引发“暴政”。

成年的你，心中是否住着一个需要安慰的小孩？

《他乡的童年》里有一幕“出戏”的场面。芬兰一集中，孩子们到敬老院，和老人一起画画。周轶君问一个老人学过画画吗，她说她没有，只是小时候喜欢画画。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不用担心说画得不好。这些画不是用来竞争的，而是自由表达自己。

作为出镜主持人的周轶君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她在旁边看着大家画画，突然哭了。

女教师拉妮走过来，拥抱她。在拉尼的怀抱中，周轶君流着泪说：“我从小受的教育里，有太多声音说你不能干这个、你不会干那个，其实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永远不孤单、不会陷入绝望。”

弹幕里，网友一同流泪，一同被鼓励、被治愈。

直到今天，周轶君依然觉得自己拍得最开心、最感动的就是这一集。“对于我这个成年人，芬兰之行解开了我成长中的一些心结。”她说。这一集播出后，芬兰俨然成为众多网友心目中“童年”乌托邦。

英国那一集，却以不同的方式，再次触痛了很多人的内心。这一集对英国私立学校的呈现，引发了观众对于贫富差距的大讨论。

周轶君是剑桥大学研究生，在她眼中，英国私立学校的教育，有很多跟钱无关。“当你理解了它的理念，就能发现没钱也能得到‘同款’。”周